

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作家与城市关系研究

——以1930年前后的上海为例

○ 高兴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要]文化地理学和文学研究具备学理上的关联,但二者尚未实现有效整合。实际上,文化地理学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正是在“主观性”方面实现契合与共通,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必须关注作家活动的主观地带和机能区域,城市理应成为重点考察对象。作家的城市分布格局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外部表征,关涉作家的城市认知与价值判断,并且成为表述城市文化的价值象征。此外,心像地图和城市认知是探究作家与城市文化互动关系的重要路径。以1930年前后的上海为例,可以明晰地阐释作家与城市的文化地理学关系,进而揭示文化和空间的互证规律。

[关键词]文化地理学;作家;城市;上海;1930年前后

借镜文化地理学的思维方法,或者从城市视阈考察文学发展规律,二者均是当前学术界拓展文学研究格局、创新文学研究模式的有效路径。前者在金克木、严加炎、颜纯均、吕嘉健、赵小琪、邹建军、梅新林、曾大兴、刘士林等研究者的辛勤开掘下,已经初具规模;后者起步更早,队伍更壮观,成果较丰硕,李欧梵、张英进、赵园、吴福辉、杨义、李今、李洁非、张鸿声、杨扬、杜心源等中外学者均有精深造诣。

从研究现状来看,上述两种研究路线基本上是各自分离的,迄今未能实现交叉与融合。此外,文化地理学视角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所见较多,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很少涉及;^[1]而且,大多数研究者借用文化地理学“文化区”的宏观概念开展作家研究,对作品的“景观研究”仅仅“只是对作品中的自然景观和物质文化景观加以研究”,^[2]忽略了空间区域与作家精神心理的相互关系。在城

作者简介:高兴(1978—),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

市文学研究方面,学界盛行着一种“反映论”式的研究模式,“强调的是城市之于作家的经验性”,没有顾及作家与城市之间的“复杂互动关联”。^[3]鉴于这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整合文化地理学观点和城市文化理论,以1930年前后的上海为例,从文化地理学的维度考察中国现代作家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一、主观地带和机能区域:作家与城市的文化地理学关系

国内学界通常认为“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研究“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组合”,^[4]它具有鲜明的科学内涵,因为“文化地理学的课题是发现文化所具有的地域的、环境的、景观的各种模式,并说明其过程,解释其所具有的含义”。^[5]不过,学者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单单是客观的诸现象的容器”,“地球上的任何场所因其所居住的人们主观意愿而影响着世界”,文化地理学更是对人类“具有象征体系的价值含义(意味)”的一种“解释”方式。^[6]

文化地理学理论是否已被有效地运用于文学研究?换言之,当今的文学研究是否已较好地展现了文化地理学的理论视阈?有些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目前国内借鉴文化地理学理论的文学研究成果中屡屡出现的“空间”一词“是一个模糊而宽泛的概念”,那些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的“能指符号”并非“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空间研究”使用了“人文主义”的方法,它“不强调发现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而是强调个别性和主观性”,常常表现出“一些唯心主义倾向”。^[7]此论点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不少文学研究者搬用文化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时所陷入的误区。然而,问题的症结不宜归结于文学及文学研究的“主观性”,恰恰相反,文化地理学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主观性”的人文精神方面实现契合与共通。

综观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地理学研究,英国著名学者迈克·克朗撰写的《文化地理学》较有代表性,该著在学界影响甚大。迈克·克朗指出文学“体现了对空间现象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努力”,“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他还直截了当地宣布“文学作品的‘主观性’不是一种缺陷,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性’言及了地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他“仔细研究了描绘城市的各类作品”,关注“这些形式各异的作品就城市生活的本质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他曾经断定“地理与文学的关系,即一种比仅作为资料或是‘主观行为’更为复杂的关系”。^[8]迈克·克朗不仅研究文化的空间分布情况,也注重考察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是如何使文化与空间建立双向互动关系的。迈克·克朗坚信人的实践活动和主观精神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发挥的独到作用,文学作为“主观性”极强且反映人类生活图景的文化现象,自然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笔者亦认为:“主观性”是文学与文化地理学研究相互沟通的重要纽带,探究作家眼中的主观地带,对作家勘察和描述的人文景观展开文化地理学层面的

“文本”分析,藉此“研究和发现为什么地理景观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以及它们的意义是怎样改变的又是如何被争论的”,从而实现地理景观的“双重编码”与多维“解读”,^[9]这样的学术路线显然执行了文学和文化地理学的交叉研究策略。迈克·克朗尤其强调“‘主观’的地区经验和人们对地区的理解”并确认“人文地理学充满情感”,^[10]可见作家和主观地带的文化关系既是文学的考察对象,又符合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据此,我们完全可以从文化地理学视阈观照作家与城市的空间关系,以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为例,这个摩登大都会在当时充分发挥了文人“避难所”和“乐园”的两大文化功能,“不同类型的文人对于这两大空间功能的价值取向有所分歧,各种都市建筑空间在两大功能之间所占的分量也不尽相同”,通过深入研究便能发现“各类文人对于都市空间所作的不同评价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他们特有的文化逻辑”,进而表明“上海都市空间的文人映像对于揭示上海文化场域生成的空间形态具有独特的意义”。^[11]作家对于城市空间的精神“编码”属于主观行为,却也折射了人在既定历史语境中的深层文化心理。

城市并非作家活动的全部区域范围,之所以要从城市的空间视角考察作家的文学实践,主要因为城市是一个吸纳和集聚作家的奇妙地带。作家常常辗转迁移于城市和乡野之间,为克服作家的流动性引发的视点模糊,有必要采取动态的分析模式,更多地关注作家与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机能地域”(而非“均质地域”),“机能地域”是“以某个场所为中心,由各个场所具有的机能相互结合的某个统一的地域”,城市即为一种常见的“机能地域”。^[12]在文化地理学家看来,“机能文化区”区别于“形式文化区”,“它不是根据文化特征在空间上的分布,而是根据政治上、经济上、或社会上某种机能(或机制)而组织起来的地区”,^[13]“机能上的城市”意味着“一个城市的影响范围往往超出其行政上的管辖界限或相邻的郊区”。^[14]城市的机能区域效应最适宜用来考察作家的空间流转规律。刘易斯·芒福德精辟地指出:城市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先具备磁体功能,尔后才具备容器功能”,城市的“磁体”功能“把一些非居住者吸引到此来进行情感交流和寻求精神刺激”。^[15]与乡村相比,城市拥有“特殊的政治空间、庞杂的消费市场、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及发达的出版印刷业等诸多优势条件”,^[16]为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创造了最佳环境,对作家活动构成了巨大的感召力,遂成为容纳和培育作家群落的机能地域。

在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史上,上海曾是作家奔赴和趋集的主观地带与机能区域之一。众所周知,1927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剧变,大批作家从四面八方涌向当时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城市上海,其中有不少人来自“北京、广州、南昌、武汉、重庆等各个城市”,也有一些作家“逃离动荡、凶险的乡村社会而闯入都市”,还有一部分人是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17]他们与久居沪上的作家协同组建了丰富复杂的作家生态圈,使上海成为引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核心空间。1930年前后的“上海现象”有力证实:城市在发挥文化辐射

作用之际,也充分凸显了机能区域的地理魅力和文化风采。

二、空间结构及价值象征: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分布规律

文化地理学“研究人们如何阐释和利用地理空间,即研究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研究这些空间和地点是怎样保留了产生于斯的文化”,迈克·克朗致力于寻索“精神与文化、人的实践活动与地域,以及各种文化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18]分析了城市“活动区域的隔离”现象,指出文化地理学必须探索“分散的、零星的文化形式的并置,以及在这种并置中所产生的新的特征”,断定“与某一特定空间和地理位置紧密相连”的人类文化呈现为“一种地理方式或格局安排”。^[19]我国学者王恩涌发觉城市除了受自然环境影响之外,还接受“社会、人文因素的作用”,“各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也与其规律之间呈有规律的现象”,城市居民的活动安排受制于“城市内部的地域结构”,它“反映着有某种动力在促使其形成不同的功能区”,这种动力主要包括“集聚力”和“离散力”。^[20]城市的空间格局与城市人的精神结构有必然的关联性,城市人的区域分布及活动情况反映了城市文化在空间板块中的集聚和离散功能。

城市区域景观是表达城市文化的价值象征,因为“文化对于不同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各类人群使用不同的“象征物”赋予事物以专有的文化意义。^[21]文化地理学家倾向于“将地理景观看作一个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认为“考察地理景观就是解读阐述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22]文化地理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是对客观环境的“价值含义(意味)的解释”,前者需要“通过研究者主观解释”并运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论”,^[23]后者是人类“认识与评价的统一、理智与情感的统一、真理追求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向人们揭示真理的同时也向人们呈示着意义”。^[24]在阐释人文景观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方面,文化地理学与文学是明显一致的。文化地理学家高度重视作家对于区域景观的认识和描述,迈克·克朗认为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展示了心理分析方法与当代美国城市权力的空间化现象,并且“通过两者不断地互动来表明什么是象征性的地理和关于城市的知识”。^[25]考察作家对城市空间的理性认识 and 情感体验,追寻城市人的价值观念,其文化地理学意义不言而喻。

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分布规律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许纪霖发现民国时期的上海文人具有天然的空间秩序:“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有其特定的城市活动空间,比如现代主义派文人必定在法国城的咖啡馆聚会,这是作为都市布尔乔亚阶级的空间象征,而左翼的波希米亚人常常出没于虹口地形复杂的弄堂、亭子间、小书店和地下咖啡馆,充满了密谋的氛围。至于公共租界,则成为了不同知识分子彼此交往的公共空间。”^[26]许纪霖为我们大致勾勒了上海文人的空间活动版图,对文人的文化立场作出归类。我们还应注意到文人在都市中的活动场所并非固定不变的,他们可能根据生活或事业的需要在各区域之间相机游动,譬如在1930年前后,左翼作家茅盾曾由虹口迁到公共租界,现代派作家

(“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施蛰存等人因为开书店的缘故而一度穿梭在北四川路邻近,表明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的文化空间对于各类作家而言具有多面的价值标识,众多作家以各自的城市活动为上海绘制了五彩斑斓的文化地理图谱。

在1930年前后的上海,左翼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冯雪峰、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阳翰笙、洪灵菲、戴平万、胡风、周扬、夏衍、蒋光慈、钱杏邨、冯乃超、柔石、沙汀、潘汉年等人聚居在虹口区的四川北路周围,主要分布于闸北宝山路三德里的创造社出版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的内山书店以及鲁迅寓所(先后住在横浜路的景云里、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施高塔路的大陆新村)附近,但他们又时常从上海最北部的闸北、吴淞、江湾、真如等(华界)及虹口(华、租交界处)等地闯入租界区域,乃至远行到南市。海派作家邵洵美、叶灵凤、章克标、张若谷、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曾朴、徐蔚南等人雅集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心区的南京路与霞飞路,偶尔也去逛一逛北四川路上颇具情调的“新雅茶室”。“新月”派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孟侃、刘英士、潘公旦等人常居租界之内,福州路、环龙路(今南昌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极司菲尔路(今乌鲁木齐路)的新月书店及其编辑部、徐志摩寓所和胡适寓所是他们的文化园地。郑振铎、叶圣陶、傅东华、章锡琛、丰子恺、夏丏尊等“开明”派作家集结在闸北宝山路与上海北部的天通庵路、东北部的江湾路,商务印书馆、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这三个文化机构是其大本营。不同文化立场的作家构造的空间布局映射了上海在1930年前后的政治权力体系和城市发展机制:上海三大区域板块(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在“经济发展的规模、商业经营的风格、文化艺术的氛围”以及“社会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鲜明差异,“上海的街道、旅馆、舞厅、公园、马路甚至车辆”等文化元素“在三大都市区域中的位置和形态”以及“各区域管理者的权力实施情况”成为影响居民空间分布的集聚力和离散力。^[27]

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分布格局造成都市文化空间结构的表征,也关涉作家对于上海各区域的文化认知与价值判断:华界与租界的毗邻区是特异的弹性权力空间,成为左翼作家斗争和冒险的绝佳据点;法租界的异域情调和浪漫气氛非常适合海派作家的艺术想象;留学欧美的“新月”派绅士作家喜爱在宁静有序的英美租界内高谈阔论;朴实庄重的开明派作家远离洋场,固守在偏僻的华界角落默默耕耘。不同的城市活动空间象征不同的文化价值诉求,“从表面上看是文人选择了活动场所,但从另一面来说,又何尝不是特定的文化空间选择了最适合于它的人群”?^[28]与文化地理学家的看法大体吻合,作家的空间布局反映了“魔都”上海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负载的多种功能。

三、心像地图与城市认知:作家与上海文化场域的互动性

分析人们对周遭环境的认知方式和认知效果,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文化地理学研究者提出:“心像地图是分析人们如何将各个场所在大脑中

形成认知地图的过程与结果,扩大了原有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在人们的头脑中容易描绘城市的空间和唤起对城市空间形成的认识的必要性,所以心像地图在新城市的规划与城市的再开发等应用方面也受到一定的评价。”^[29]人类的这一精神现象不单适用于城市建设工程,也可以用来指导城市文学及文化的学术研究。考察作家与城市的文化关系,就应当深刻解析作家脑海中的心像地图,根据作家的认知特征推测某些城市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独占地位。

研究作家的心像地图与城市认知,可以从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当中找到理论支持。人文主义地理学十分重视“概念空间(Space)”和“场所感(Sense of Place)”的分析,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那里,“空间代表的是一个有共同意义和价值群体的区域”,“场所感”意味着“场所与其中的人密不可分”,“场所”能够“将空间组织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中心”,它为人类提供“活动背景”,也“给个人或集体以安全感、身份感(Place Identity)”。^[30]“在各种文化景观中,没有像城市这样最集中、最突出反映了人类文化特征的”,^[31]而作家是心灵丰富、思维活跃的社会群体,既然“区域空间的人文景观能在文人的主体世界中留下精神映像”,^[32]他们对城市空间的“场所感”自然极为敏锐,北京、上海、重庆、桂林等城市的历史影像都曾经被诸多作家广为描摹。不妨审视一下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的心像地图与城市认知,从中可以洞悉作家与城市文化场域的互动性。

首先,必须辨析作家对于上海城市形象的宏观体验。在1930年前后,左翼作家一方面倾向于以贫富对照、善恶对立的政治目光来观照上海作为罪恶“渊藪”的城市形象;另一方面,他们“从上海空间中看到了黑暗和罪恶,同时又从中发掘通向未来的希望之光”,上海成为左翼作家的“子夜战场”。^[33]自由主义作家鄙弃都市人的放浪和夸饰,商业文化气息浓厚、注重物质利益的上海社会在他们眼中显得低俗不堪,但他们毕竟承认上海文化出版业的发达,上海在自由主义作家眼里既弥漫着“低俗习气”又意味着“活力空间”。^[34]海派作家和通俗文学作家最为亲近和熟悉摩登化的上海,他们指认畸形的上海洋场社会是诱惑人们堕落的陷阱,却依然醉心于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异国情调”和诗意美。上海赋予中国现代作家以多元化的身份意识和话语背景。

其次,需要考究作家对于上海租界的认知与评价。租界是近现代上海的反常空间,左翼作家惯于从政治意义上描述租界为“罪恶渊藪”,“租界”一词成为左翼作家批判他者的有力武器——对怯懦的租界居住者的一种辛辣嘲讽。在鲁迅、成仿吾、冯乃超、孟超、殷夫等左翼作家的笔下,“租界”几乎成为黑暗帝国的代名词,而寄居其内的文人总免不了堕落的嫌疑,指出某人避居租界的事实即可达到攻击此人道德污点的目的,连“半租界”也遭忌讳。海派作家在空间观念上没有发生“租界”、“半租界”之类的道德争议,曾朴父子、李金发、邵洵美、张若谷、梁得所、徐蔚南、徐霞村等人反而在租界中如鱼得水,无拘无束地活跃在租界的沙龙、书店以及各种形式的聚会场所之间,“租界”成为他们“上海”意识的核心成分。自由主义作家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沈从文等人在1930年前

后很少直接抨击“租界”，因为他们的精英形象离不开“租界”文化氛围的映衬。栖居于同一座城市而“场所感”不同，左翼作家、海派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具有迥异的上海心像地图。

另外，还要追问作家在上海区域空间中的迁移奥秘。城市里的作家并非静止不动的，他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文化价值追求，结合自身与社会的双重条件，在城市中不断地探寻和游移，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而作家的区际游动更能显示人与城的文化互动性。1930年前后的丁玲和胡也频在上海的活动情况便是一例：他们到达上海之后，先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贝勒路（今黄陂南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环龙路（今南昌路）、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善钟路（今常熟路），胡也频被捕牺牲后，丁玲常常前往北四川路一带活动，1933年迁居虹口区的昆山花园路。丁玲从租界“洋场”到闸北、虹口“左翼”基地的区域移动，在上海文化地图上勾画了一个文学青年向左翼战士转变的空间轨迹。

最后，不能忽略作家与上海文化场域的历史关系。文化地理学研究要深度查勘“与场所相联系的情感、意义和象征”，就应当注意到“场所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35]1930年前后的作家与上海文化场域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1927年之后的上海聚合了四面八方的各类作家并铸就了一段至为辉煌的文化高峰期，但是在1930年代中期之后，作家纷纷从上海向北京、武汉、广州、长沙、西安、桂林、重庆、昆明、延安、香港等地转移，上海文学生态质量急剧下降，作家争鸣和文化多元的人文景观逐渐模糊起来。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与上海本身的发展遭遇有关，也反映了中国城市作为一类文化场域，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的灾难岁月中，它所占的空间位阶和话语份额黯然衰减。

文化地理学至为重视地图系谱的研究，主张“通过考察过去的地图所描述的世界观等精神世界，能够试图解读那个时代的某个地域的文化”，有的学者宣称“地图是人类心中所具有的精神世界和外部存在的物理世界的中介者”，^[36]毋庸置疑，心像地图比物质地图更能证验人类精神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妙合无间。同样，文学研究也十分关注作家心灵地图的勘探，因为优秀的作家无不具备“自己的观察与评价生活的独特角度”，继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专属的“艺术世界”。^[37]由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的心像地图可以看出：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研究在探析作家的城市认知方面能够建立学术关联。

四、结语：文化和空间的互证——作家与城市的文化地理学关系

当下的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迫切需要“科学、多样的研究方法”，科学主义取向的社科研究方法固然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而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提倡差异和多元”的新理念也值得反思，“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问题选择恰当而多样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接近事物复杂多变的本质”。^[38]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整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既然“地球上存在的事物几乎都能成为文化地理学的对象”，^[39]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确有学理上的可行性。

文化地理学既研究文化的空间分布情况,也考察文化衍生空间意义的多种方式。本文从多方面探讨了作家与城市的文化地理学关系,认为城市作为主观地带和机能区域,依据作家对城市的精神编码方式,可以查证文化与空间的双向互动现象;通过分析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分布规律,推断城市的空间格局与城市人的精神结构有必然的关联性,城市人的活动空间象征其文化价值诉求;考察1930年前后的上海作家的心像地图与城市认知,发现城市人的“场所感”彰显人类文化赋予地理空间以意义的效应及其表征。总而言之,文化和空间的互证规律是研究作家与城市的文化地理学关系之逻辑起点。

注释:

- [1]汪娟:《文化地理学与中国文学研究概观》,《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 [2][7]陈迪文、徐旭:《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之综述》,《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 [3]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 [4][13][14][20][31]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14、313、348-352、360页。
- [5][6][12][23][29][30][35][36][39]王鹏飞:《文化地理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18、59、18、71、230、230、214、261页。
- [8][9][10][18][19][21][22][25][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0、37、39、2-3、4-5、4、25、47页。
- [11][16][17][27][28][34]高兴:《中国现代文人与上海文化场域(1927-1933)》,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10-212、20、122、121、138、74页。
- [15][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倪文彦、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6页。
- [24]重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7-148页。
- [26]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 [32]高兴:《桂林“文化城”的文人映像及文学生态》,《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 [33]高兴:《渊藪与战场——革命文学作家对于民国上海的空间体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 [37]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
- [38]叶洪、[澳]Julie White:《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后现代转向》,《东南学术》2012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黎虹]